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 吴信训工作室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新媒体系列

吴信训 何道宽 主编

# 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英] 尼克·库尔德利 著  
Nick Couldry  
何道宽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 吴信训工作室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新媒体系列

吴信训 何道宽 主编

# 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英] 尼克·库尔德利 著  
Nick Couldry  
何道宽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英]库尔德利(Couldry, N.)著;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

(复旦新闻与传播学译库.新媒体系列)

书名原文: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ISBN 978-7-309-10438-7

I. 媒… II. ①库…②何… III. 传播媒介-研究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7930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2-830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英国政体出版社许可本书由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独家发行。

All rights reserved.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英]库尔德利(Couldry, N.)著 何道宽译  
责任编辑/章永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362 千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38-7/G·1278

定价: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们考察用的参考轴必须旋转,但那是围绕我们真实需求不动点的旋转。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978[1953]: 46

## 中文版序

几个星期之后,我的《媒介、社会与世界》中文版即将问世,思之令人激动。该书凝聚了我15年思考媒介与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心得:我吸收社会理论,努力提出一套理论概念,以廓清这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

在我们这个时代,媒介及其制度的性质正在剧变,这些变革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影响涉及各个层次,直至全球规模。本书论述媒介如何推进人对“社会”和“世界”的贡献,这里所谓“世界”,既是地缘政治世界,亦是人的经验世界;人的经验世界有时可能是非常局部的经验,但常常是本地和远方要素的混合。这些经验内容和界面谓之“媒介”。今天,媒介变革的某些方面几乎面目全非,与十年前迥然不同了;建设合法性媒介制度并使之成为全社会“发声”的可行性,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信息和媒介平台剧增,我们跨界迁徙的能力随之增强,广告的性质也受到深刻的影响。如此,支持媒介内容制度性生产的基本经济的要素,亦处在巨变之中;媒介变化的长远压力正在加剧,且不限于报业。这一切变革的性质是跨越国界的,由技术复制和模仿驱动,不受国界局限,因此,用国际视野思考媒介、社会与世界的关系势在必行。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促进围绕媒介、社会与世界关系的论辩,中文版的问世对促成这样的论辩,意义重大。

中国是社会体量最大的国家,它所面对的如何组织社会政治和媒介的关系问题也是最复杂的。因此,在思考媒介、社会与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点。但我得承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前几年间,中国并不在我思考问题的前列。我写书时身居英国,想要提出媒介制度权力的社会再生产的一般理论。不过,我也有意从事媒介研究的国际比较。我的田野工作基于英国,彼时的媒介研究以英语国家视野为主导,那种视野足以支撑我的研究:我不必关注自己论述的实用性是否有明确的国际例证。今天,我不必为本书的视野辩护,因为英语拥有“普世性”的观点是我和其他作者彼时的典型特征。然而实际上,我的“媒介仪式”理论(2003)已被用于中国“超级女声”(Supergirl)等媒介现

象；此外，我的《媒介仪式的批判路径》(*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正在被译成中文，即将在中国出版。令人高兴的是，媒介研究领域已经高度国际化，像我过去那样把特殊当作一般来论述不再可行了。

这一变革之所以发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媒介研究领域重要成果的影响，例子有詹姆斯·柯兰和朴敏均(Min-Jyun Park)合著的《媒介研究的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和达雅·屠苏(Daya Thussu)的《媒介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底层因素也在起作用。首先，作为媒介研究的对象，民众流动的国际化日益强劲，阿荣·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称之为“民族景观”(ethnoscape)。其次，人们日常的媒介经验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人的意识范围大大超越了本地的范围甚至国家的边界。频仍的可怕事件(如“9·11”恐怖袭击)以及中国、日本、南亚等地的环境灾难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同理，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新传播技术比如手机的使用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因此，人们日益意识到新传播技术的重要性，并普遍感觉到万维网高效而无穷的链接功能。还有一个潜隐、见效略缓的原因：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媒介基础设施的根基剧变，且涉及许多维度，如果只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那就不足以把握正在发生的变革，也不足以了解外表虽变而实际照旧的现象。比如，如果你有志于研究博客，却不考虑其在韩国或伊朗的发展，岂不是很荒唐？因为在几个时间点上，博客在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显著的地位。同样，如果你有志于研究推特之类的微博客平台，却又忽视中国的微博，你就不可能是严谨的学者，因为在中国独特的政治语境中，微博的政治权重无与伦比，远超推特在西方的地位。

本书旨在探寻一条路子，以思考媒介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我试图提出把握三者关系的社会理论；虽然写书的语境打上了英国的印记，但支撑这一理论的资讯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例子，包括中国的例子。那就意味着，本书在其他国家被接受的情况至关重要，那是衡量其目标是否业已实现的指标。我以极大的兴趣期待中文版问世后的反响。

然而，之所以国际读者尤其中国读者对我至关重要，还有两个特别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和本书的主题有关：在人口众多的大型社会里，制度生产的大型媒体

是否能维持其全民注意焦点的角色？是否能继续充当观照社会的“窗口”？换言之，我所谓的“媒介中心神话”是否还有长远的前途？如果其前途不佳，媒介化社会的社会政治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形式，比如，国家聚焦的政治就可能失去媒体确保的“显现的空间”（space of appearances，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sup>①</sup>语）。这些问题是英国和美国的问题，也是欧洲、美洲、中东、非洲和亚洲的问题，但媒介制度不确定的未来令人关注，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的国情是：市场与国家制度混合，政治机构复杂，较量激烈。本书不佯装为这些中国问题提供答案，然而，它提出了一些普遍有用的中程概念，第三章和第四章尤其如此；或许，这些概念有助于思考中国未来一二十年媒介制度发展的框架吧。

之所以将本书需要奉献给中国读者，那是因为它所强调的建构理解媒介的比较框架涉及许多方面，不限于我提出的理论概念。第二章描绘媒介实践的框架非常开放，许多日常生活中新近出现的与媒介相关的“实践”都在考察之列。这个框架借鉴了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实践理论”，我刻意使之非常开放以涵盖地理和历史的比较。

第七章为比较世界范围内的“媒介文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其重要维度取自一个人类7种需求的范式。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sup>②</sup>论人类“能力”的重要成果给我启示，这个比较框架还取自我和安德利亚斯·赫普（Andreas Hepp）论“媒介文化”的著作（赫普执教于德国不莱梅大学）。同时我必须坦承，本章思想的主要启示来自邱林川<sup>③</sup>博士，那是他2009年在布里斯班宣讲的论文，他论述了中国农民工对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需求。对我而言，那次经验犹如晴天霹雳，因为它使我们对媒介和信息环境的理解被颠覆了，我们开始思考，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是由底层经济需求决定的。他的研究显示农民工的特殊生活环境：千里迢

①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德裔美国政治学家、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遇》、《精神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等。

②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 ），印度经济学家、哲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福利经济学，关注穷人，代表作有《技术选择》、《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公平》、《就业、技术与发展》、《贫穷和饥荒》、《选择、福利和量度》、《资源、价值和福利》、《商品和能力》、《伦理学与经济学》、《生活标准》、《饥饿政治经济学》、《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身份与暴力》等。

③ 邱林川，传播学博士、副教授，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发展传播学、社会阶层与阶级、全球化及社会变迁，著有《新媒体事件研究》、《移动通信与社会》、《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等。

迢离乡背井外出打工。于是我想，“需求”应该是形塑世界上无数“媒介文化”的关键要素，这是底层需求的要素。

鼓励比较视野的兴趣还见诸最后一章，目的是反映建构全球媒介伦理的可能性，媒介伦理应该充分反映各个层次包括全球层次的媒介问题。这一章还思考建设媒介话语的可能性，有关媒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布的公正和不公的问题，均在考虑之列。

以上几个方面显示，本书等待翻译成中文已有一段时间，我期待聆听这个中译本激起的论辩。我相信，如果有幸跟踪中译本的反响，不同意见的论辩将对我思考媒介、社会与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序文结束之际，容我感谢何道宽教授为本书的翻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是他把本书送达中国读者。同时，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效运作，感谢他们对本书的信赖。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朋友邱林川博士，不仅要感谢他在本书构想过程中给我的启示，已如上述，而且要感谢他的鼎力推荐，使中译本成为可能。

尼克·库尔德利

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2003年11月



# 译者序

## 一、作者译名和成就

Nick Couldry 的译名混乱,计有寇德瑞、库德瑞、柯尔迪三种。经请教 Couldry 本人,决定定名为尼克·库尔德利(他告诉我,其家姓读作 cool dry)。

库尔德利是英国传播学教授,执教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他主攻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和媒介社会学,继承并弘扬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他紧追学术前沿、思想新锐。在 15 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推出的 8 种学术论著分别是:

- 1.《媒介仪式:批判路径》(*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 2.《为何发声那么重要: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文化与政治》(*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 3.《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 4.《洞察文化:文化研究方法的再想象》(*Inside Culture: 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
- 5.《媒介权力的地位:媒介时代的朝觐者和目击者》(*The Place of Media Power: Pilgrims and Witnesses of the Media Age*)
- 6.《全球时代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
- 7.《媒介消费与公共参与:超越注意力的预设》(*Media Consumption and Public Engagement: Beyond the Presumption of Attention*)(合著)
- 8.《超越回声的聆听:不稳定世界里的媒介、伦理和中介》(*Listening Beyond the Echoes: Media, Ethics, and 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合著)

## 二、书名解析

《媒介、社会与世界》含三个关键词。作者对其作了如下解释。

“社会”还是那个常规意义: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容器。不过,有些跨国界

的人生活在几个“社会”里。

“世界”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大到地球这样大尺度的空间。

“媒介”比“传播”的意义狭隘，但比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的意义宽泛得多。“媒介”包括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形式和界面。

本书的副标题“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有两层意思，意在避免两种错误的转向：①空中楼阁式的媒介理论；②规避大话空话。作者竭力使媒介理论贴近普通人，而不是技术精英。

### 三、主题、方法论与提要

《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突出媒介实践和媒介仪式，破解媒介权力的显著特征和隐性伤害，阐述媒介化社会的奥秘，批判媒介中心神话，探究媒介文化底层的社会心理文化需求，构建媒介伦理和媒介正义框架。

该书分八章：数字媒介与社会理论；媒介实践；作为仪式和社会形式的媒介；媒介对社会的隐性形塑功能；网络化社会，网络化政治；媒介与资本和权威的转化；媒介文化；媒介伦理，媒介正义。

第一章为导论，以媒介研究的方法论为重点；第二章讲媒介实践，是作者媒介研究方法论的落脚点；第三章重点考察媒介仪式和媒介中心神话，讲媒介的分类和范畴；第四章论媒介的隐性影响，包括隐性的伤害和符号的暴力；第五章是对媒介批评的批评，讲媒介的政治经济学；第六章审视媒介饱和对教育、医学、法律、政治等领域的影响，重温权威、资本等经典概念；第七章回到媒介文化的底层动态关系，从经济需求、族属需求、政治需求、被承认的需求、信仰需求、社会需求和休闲需求审视媒介文化；第八章研究当代生活方式涉及的伦理问题和正义问题。

作者用一个四端的金字塔来图示媒介研究的四种可能的方法论：媒介“文本”，媒介生产、流通和接受的“政治经济学”，媒介的技术性能，媒介的社会应用。本书的方法论偏重第四种：媒介的社会应用，即媒介实践。

他对这一方法论作了如下解释：“按照这一理论，被置于前台的是媒介如何被应用，如何形塑社会生活，在媒介里流通的意义如何产生社会影响。这种媒介理论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名字，所以请允许我用一个略显笨拙的名字：社会取向的

媒介理论 (socially oriented media theory)。这一理论建基于媒介建构的、媒介使之成立的社会过程。其学科联系首先是社会学,而不是文学、经济学、技术史和视觉传播。”(p. 8)

又追加了三点说明:“第一点,这不是媒介中心主义的方法论……第二点,我的方法论焦点不是媒介产品、界面和平台的生产,而是人们利用这些媒介的产出从事的任务……第三点,本书有意成为一个工具箱,我们借用社会理论的棱镜考虑日常实践与数字媒介的关系。”(pp. xi - xii)

第一章“导论”提出本书试图回答有关媒介理论的六个问题:①什么是媒介,谁是媒介,媒介在哪里?②我们用媒介做什么?③媒介的运行还有经济活力吗?④媒介机构的社会/政治地位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⑤媒介以多大规模产生影响?⑥怎样才能用媒介生活得好?(p. 12)

以下各章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本书的“总结”以明快的语言重申各章要义,值得大段引用。(pp. 206 - 208)

“第一章检视媒介及其未来的不确定性……

“本书的主要论点始于第二章,我们探索媒介实践,探索形塑媒介实践的基本需求如社群、互动、协调、信赖和自由的需求,在个人的层次上、个人与他人以及群体的层次上探索媒介实践是如何形成的……

“在第三章里,我们探索媒介在社会形式(如仪式)生产中的作用,其背景是一切人对稳定和秩序的需求;在这里,大型机构(国家、公司、媒体)控制资源和权威的驱力与个人和群体被承认的需求产生冲突……

“在第四章里,我们具体考察个人、群体和社会被伤害的可能性,媒介机构运行的赤字或失衡可能会造成伤害:在这一章里,媒介不公的问题首次浮出水面……

“在第五章里,我们考虑媒介对大型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隐含的命题,又考虑数字媒介原则上能促成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大尺度延伸。有人看见走向更大民主化的转移,同时,我们发现很大的不稳定性:各种规模的社会行为者利用扩大了的行动范围,它们的争斗导致的民主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无疑,如果没有自由媒介,民主就不可能;但其自然结果未必是,“更多的媒介”就意味着

“更多的民主”；更加精细的社会研究势在必行。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传播空间的密度，传播空间由某些制度力量主导的内在趋势，媒介饱和和文化对这种主导力量持续的挑战所受到的内在约束……

“在第六章里，我们考虑了媒介化在一些领域产生的后果；这些领域生成了权威、权力、资本和个人被认可的名望，人们为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展开争夺……

“在第七章里，我们用国际化的参照系去考虑各种媒介文化，我们对媒介文化的理解被置入多重历史轨迹的语境，我们在形塑人类生活的全套需求里去理解媒介文化……

“在第八章里，我们考虑我们生活中的媒介伦理、媒介正义和媒介不公。我们考虑了一些基本的价值，比如协同、合作、无伤害的好处。”

#### 四、相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怀

近年来，我翻译出版了几种政治学、传媒政治经济学和媒介文化的书，均有创意，颇有锋芒。它们是：《新政治文化》（社科文献），《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人大），《互联网的误读》（人大），《媒介、社会与世界》、《群众与暴民》和《新新媒介》（复旦）。

《新政治文化》断言阶级政治消解，党派政治式微，侍从政治淡出，认为阶级、党派、阶层、群体、集团的利益似在趋同。然而，它又承认，在乌托邦似的理想社会实现之前，任何社会都是分层分派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非马克思主义的分层理论仍然适用。

《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批判“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质疑由资本家的利益和狭义的政府利益决定的文化议程。

《互联网的误读》从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介绍互联网的历史与现状，批判技术中心主义，矫正敬畏、惊叹和迷信的误读，现实针对性极强。

《媒介、社会与世界》是媒介研究和媒介社会学的力作，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破解媒介文化比较研究中的西方中心思想。

《群众与暴民》梳理数千年来群众与暴民这两个关键词的演化，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力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网络政治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新媒介》从媒介哲学和媒介演化的角度阐述了新新媒介的性质、定义、原理和特征,探究新新媒介和个人社交媒介的社会文化影响。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3年6月26日

## 前 言

本书讲媒介对社会组织和我们人生在世感觉的影响。书名需要分解成几个关键词予以解释。“社会”还是原来那个意思：社会是社会组织的容器，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容器里。不过，国别社会(national society)的边界不再包容我们“共同”生活感觉的全部过程；有些主要的群体(无国界的人，即频繁跨越国界谋生的人)不止简单地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世界”指的是对我们的生活空间富有意蕴的环境，大到地球这样大尺度的空间。本书所论的“媒介”比“传播”的意义狭隘，但比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的意义宽泛得多。我所谓的“媒介”包括一切制度化的、用于传播符号内容的结构、格式(format)、形式和界面。当一切象征性内容都已数字化、许多平台既承载大众生产的内容又承载人际传播时，“大众媒介”和一般“传播”研究的旧式分割边界模糊起来，但我继续使用“媒介”一词去表示，“媒介”是生产、传播和接收内容的“制度化”的形式和平台，这种“制度化”的形式和平台是本书的首要焦点。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和权力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本书的副标题“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表示，我想避免理解媒介、社会和世界三者关系中两种错误的转向。首先，许多论者认为<sup>[1]</sup>，论媒介的媒介评论(media commentary about media)是蹩脚的指南，难以理解媒介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有诸多原因。大众媒介生产直接受营销实践的影响，想要营销新的产品、界面和平台的人，声称某种程度上掌控着“媒介的未来”的人，尤其影响着大众媒介的生产。媒介(及其资源)的媒介评论者常常是醉心于技术的精英，所以他们对媒介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作的解说，必然和他们自己的区分策略(strategies of distinction)捆绑在一起。媒介制度潜隐的兴趣是维护自己在社会基础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基础结构是我们寻找“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社会基础结构影响着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叙述。其次，为了规避媒介研究中大话空话的陷阱，我们的研究必须贴近所有人，贴近他们正在用媒介所做的事情，而不是贴近热爱技

术的精英。因此,你在本书中找不到多少精英人士早期采用技术的内容,我更感兴趣的是横跨人口断面的群体使用媒介的习惯。我感兴趣的焦点是人们使用媒介的日常习惯,是人们日常的一些设想:如何用媒介做事情,哪里去获取信息和形象,什么信息能得到流通,如何流通;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掌握媒介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在过去的15年间,以上的一些设想一直在迅速变化。

说媒介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那就意味着一个或隐或现的观点:社会世界(social world)里“存在着”什么。这就是采用了社会本体论(social ontology)的立场:在我们所谓的“社会”空间里存在着什么样的事物、关系和过程。在一个层次上,这意味着吸收“社会理论”。但在这里,我们必须避免另一个更加微妙的陷阱:我们吸收的一种牌号的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理解媒介正在发生的变化起到了局限的作用。

三种问题造成了这样的局限。第一,至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都忽视了对媒介的论述。直到安东尼·吉登斯<sup>①</sup>对现代性的研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对媒介和现代性的研究、曼纽尔·卡斯特<sup>②</sup>对“网络社会”兴起的研究问世,这个受局限的形势才得以逆转;接踵而起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对传播技术和其他技术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变化的研究<sup>[2]</sup>。顺便指出,政治学也出现同样的盲区<sup>[3]</sup>,而且人们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这样的盲区。第二,这些干扰妨碍人们理解媒介改变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不能激发视域宽广的研究,比如,有关媒介如何改变其他社会学术语(阶级、群体构成等)的研究也难以受到激励。结果,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媒介如何改变社会本体的综合叙述。第三,有些社会学家把媒介作为自己优先的研究对象,他们优先研究的是媒介的技术基础,但这个版本的社会理论无助于理解媒介,无助于理解媒介在社会生活里的作用。有时,这种研究受一种转向的影响:或者是“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的转向,或者是更加宽泛的、摒弃任何

---

①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英国社会学家,提出结构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整体论,著有《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超越左与右》、《失控的世界》等。

②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1942—),西班牙裔美国传播学家、国际著名学者,长期在欧美若干大学执教,著有20余种书,要者有《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互联网星汉》、《网络社会的崛起》、《传播的权力》等。

社会秩序观念的转向,其偏爱是非排他性的语汇诸如“情感”、“强度”,甚至“纯内在性”(pure immanence)。诸如此类的方法论将广义的哲学反对意见搁置一边<sup>[4]</sup>,无助于我们对媒介表征世界进行分析性把握,尤其无助于我们把握媒介如何表征社会现象及社会排序机制,因为媒介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表征社会现象。同理,这些方法论政治上也无助益,因为它们不理睬媒介在社会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忽视媒介表征作用的失灵——在表征日益不平等的多种世界上,媒介显然是失职了。

思考媒介时,我将利用并发展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它重视表征、表征权力的作用,重视我们与表征技术的互动,重视我们在“社会秩序”里如何发挥作用。社会秩序不是既定的或自然的状态;它是在实践中建构,用符号表征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媒介表征帮助建构和实施那样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不是既定的活自然的状态,它是在实践中构建的,用符号表征的;媒介对社会生活秩序的表征有助于秩序的规定和运行。

在社会理论的层次上,本书以第一、二章的本体论(在社会和媒介的世界里存在着什么)开卷。接着的第三、四章讲分类和范畴(媒介如何分割并整合社会世界)。第五、六章转向累积:为建设或反对权力而积累社会资源,以及累积和竞争过程中出现的系统的复杂机制。第七、八章讲评估问题:形塑群体和文化在无限多样的媒介中进行挑选的需求;媒介如何促成我们共同生活的大评估框架——我们珍惜的、公正的共同生活的评估框架。使全书多种主题纽结在一起的是一种关怀:我们要更好地理解,媒介如何对我们的知识、机构和伦理作出贡献。

本书研究媒介的方法论还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这不是媒介中心主义的方法论。我不认为,媒介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媒介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它常常把媒介当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我的方法论基础是对日常行为和习惯的分析。媒介产出的形势和技术基础日新月异时,媒介分析的社会基础尤其重要。从这个大视角的起点看,出现一些难题:独立的媒介社会学、媒介研究能成立吗?媒介和传播网络实现了跨国界的指数增长,聚焦于国别社会的社会学是否成了冗余的累赘呢?这些变化过程是否根本改变了权力的性质呢?媒介的变化如何改变日常生活的现象学和伦理学呢?第二,我的方法论焦点不是媒介产品、



界面和平台的生产,而是人们利用这些产出从事的任务。因此可以说,本书意在对媒介的政治经济研究进行补充。媒介的政治经济研究使我们的认识为之一变:我们对媒介的生产和流通有了更好的了解;对形塑媒介生产和流通的经济力量亦有了更好的了解<sup>[5]</sup>。这是因为我自己的著作最初也源于受众研究。然而,媒介生产研究或媒介消费研究这样的简单划界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政治经济学必须考虑消费者或受众的生产,有时,本书还偏离生产,研究生产的逻辑。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受众”都是宏大的研究领域,这两种研究的分工还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本书有意成为一个工具箱,我们借用社会理论的棱镜考虑日常实践与数字媒介的关系。第一、二章打基础,提出总体的视角,考察媒介的当下转化,以及媒介实践的这种惯例。至于其他章节,读者不妨挑选自己的路径,不妨带着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去决定研读的顺序。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的许多探索路径中,我深深感谢两位最关键的精神导师: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大卫·莫利(David Morley),他在我这位30岁出头的后生身上看到了从事研究的潜力;已故的罗杰·希尔维斯通(Roger Silverstone)。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审读人,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在此创建了该校的媒介研究网站,我也为自己在该校的一段经历而自豪。

感谢我在伦敦大学戈尔德史密斯学院主讲的“媒介仪式”课的学生。

众多的同事和朋友以多种形式给予宝贵帮助,我对他们心存感激。

特别感谢 Polity 出版社的编辑安德里亚·德鲁根(Anrea Druggan)。

本书酝酿多年,实际撰写时则极其忙碌。感谢我的妻子路易丝·爱德华兹(Louise Edwards),感谢她的爱、支持和信赖。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

## 注释

[1] Se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Livingstone (1999: 61), Caldwell (2000: 15), Herring (2004), Hijazi-Omari and Ribak (2008).

[2] Giddens (1990), Thompson (1995), Castells (1996), Silverstone (1994). More recently, see Beck (2000a: 12), Hardt and Negri (2000: 347 - 348), Urry (2000: 183).